

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两面性

李 凭

风度，对于个人来说，是文化素养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对于一定的阶层来说，是由集中体现他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言论和行为塑造起来的社会形象。所谓魏晋之际的名士风度是指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时代一批文人的社会形象。虽然这一批文人的社会形象并不能代表魏晋时代的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但是在魏晋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因而为时人与后人所注目。所以，魏晋之际的名士风度后来被人概称为魏晋风度，例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是这样概称的。^①

魏晋风度的形成与东汉末年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动乱与政局不稳不仅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反映，而且也是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时期，皇朝更替频繁，曹魏代汉后不到半个世纪即为司马氏取代，司马氏建晋后仅40年就逐到江东。由于秦汉以来确立的帝王的至尊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因而，朝臣争权，皇室内讧，政治丑剧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为了达到夺取或把持最高统治权力的目的，各个政治集团都不择手段地攻击、陷害对手，血腥的屠戮不断地发生。曹氏篡汉，刘氏覆灭；魏晋交替，曹氏受戮；刘宋代晋，司马氏遭殃。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的命运往往朝不保夕，昨日方为座上客，今日即成阶下囚。在野的名士也不断地受到牵累，受到猜忌，甚至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惨遭杀害。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要想免遭祸害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祸福难卜的政治状况使许多名士不愿意涉足政界，他们对功名利禄避之唯恐不远，对高官宠爵逃之只怕不快。正始名士何晏有诗云“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叹曰“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但是，名士要想不与政治搭界却并非易事，因为无论哪一派政治集团都无不需利用他们的名声与才干。名士们只有绞尽脑汁，想出高招妙法，才能实现不去从政的心愿。

他们认为，避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少讲话，或者不讲话。实在不得已，也只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着边际的废话；或者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让人怎么理解都行的所谓玄言。贵家子弟钟会，精练而有才干，为司马懿所亲宠，他经常乘肥马，衣轻裘，宾从如云地出门交际。他闻听嵇康之名而去造访，《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初，（嵇）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贍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个人只对了两句话，还是空话。《世说新语·德行》记载，司马昭谈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时就称他是天下第一谨慎之人，他说，“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嵇康、阮籍这样做正是为了全身。

当然，不讲话，少讲话，或者尽讲废话，也难免会有心谤腹诽之嫌，并不见得不得罪人。后来嵇康被杀，就与钟会向司马昭进谗言有关。《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载：“（钟会）因譖：

‘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

之。”

为了达到不说话而又免遭腹诽之嫌的目的，名士们找到了两件护身符，那就是药和酒。靠这两者，既可以躲避一些人事纠葛，也可以暂时排解心头的积郁。

带头服药的是正始名士，其中又以何晏为首。王弼、夏侯玄也热衷此道。他们所服之药统称作寒食散。寒食散大多以矿物质为基本成分。其中有一种以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组成，名五石散，服用者最多，为寒食散的代表。《世说新语·言语篇》载，何晏曾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可见名士服药主要是为了精神上的需要。其实，寒食散不仅毫无滋补作用，反而还含有毒素。服药后，人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药性发作时，不仅不会“神明开朗”，反而会陷入莫名的恍惚状态。不过，这样一来，心境可以暂时地超脱尘世的纷争。而且，即使偶发狂言，有了服药的幌子，也不致引起太大的麻烦。

于是，许多人纷纷仿效，到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服药竟成了士大夫中的一种风气。有时，他们还籍着挥发药毒及散热驱寒的需要而赤膊跣奔地放浪形骸，做出种种荒诞无稽的举动来。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有些人家境贫困，服不起药，却也去假装药发而作出痴呆或暴躁的神态，甚至睡倒街头，以迷惑世人。不过，寒食散的毒性是很大的，服药之风毁损了一大批人的健康，有的甚至因中毒过度而毙命。

饮酒似乎也可以排除烦闷，况且酒精对人体的危害程度比寒食散要小一些，因此更多的人喜欢借酒消愁。竹林七贤便大多喜欢酗酒，阮籍、嵇康、刘伶等都以嗜酒出名，刘伶甚至还写了一篇《酒德颂》。这些酒鬼喝醉以后也要做出一些不穿衣服和不带帽子的怪模怪样来，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醉鬼，恰恰相反，他们的心里明白得很。《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载，阮籍经常

酗酒的原因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的酣饮是为了躲避政治风险，他总算达到了这个目的。《阮籍传》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钟会想要陷害阮籍，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同传又记载，阮籍为了拒绝将女儿嫁与司马昭之子，竟然大醉六十日，一直不省人事。司马昭始终没有找到开口提亲的机会，不得不罢休。

服药、饮酒虽然可以暂时躲过一些政治陷害，但是终究不可能彻底免灾。何晏、夏侯玄、嵇康等人最终还是被司马氏杀害了，因为，他们或者与曹氏集团有些牵连，或者说过一些不利于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话。只有阮籍后来学得乖巧了一些，写了为司马昭篡位作准备的加九锡劝进表，才总算平安地度过了晚年。

空谈、服药、酗酒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荒诞举动无疑是魏晋名士风度的一个侧面，但这只是表面的、消极的一面，并不是他们的风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如果揭开那些蒙在表面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善于思索、敢于批判的气质；看到他们富于理想、憧憬未来的精神。这才是魏晋名士风度中积极的、向上的一面，占主导地位的一面。

东汉末年以降，连绵不断的战争与此起彼伏的动乱虽然震撼了中原大地，但也冲决了经秦汉两朝垒筑而成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堤岸，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政治禁锢相应地松驰了，而儒家一统的精神枷锁也暂时地滑脱了，加上人口的流徙和民族的融合等因素，都有利于思想的开放和精神的交流。

魏晋名士的思想和行动大多处于矛盾的状况之中，他们虽然与腐朽的统治集团格格不入，因而不愿参与政治；但这并非出于本愿，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名利，并不真正地甘心脱离现实生活。《晋书·阮籍传》称“籍本有济世志”。又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

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可见其本有抱负，不过客观形势使其不得施展而已。而这种压抑的思想情感往往使他们产生过激的心理，虽然表面上往往装出一副平淡处世的样子。也正因为这样，他们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指摘时弊，冷静地去分析社会状况，揭露政治中的不合理现象，有的人甚至直接针对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进行口诛笔伐。

阮籍就曾在他的名篇《大人先生传》中对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展开猛烈的批判。他认为：“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整个世界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但是，自从有了君主制度后世界就变了样，“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诌拙，藏智用神，强者睽睢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他指出，君主为了自己的“声色无穷之欲”，就“竭天地万物之至”，残酷地剥削百姓，榨取民脂民膏，这样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抗，最终酿成“亡国戮君溃败之祸”。因此，他认为，既然君主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还不如无君。阮籍的见解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那样黑暗的社会环境中，敢于如此直率地抨击剥削制度，辛辣地嘲骂残暴的封建统治集团，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批判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名士们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那么，他们心目中憧憬的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呢？用阮籍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的话来表述，就是“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是一种无君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和老庄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魏晋名士有这种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大多数接受了老庄思想的熏陶。嵇康自称以老子、庄周为师，阮籍著《达庄论》，何晏写《无为论》，王弼作《老子注》，他们都是老庄的信徒。因此，他们向

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无君无臣、无忧无虑的小国寡民社会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们的这种思想后来被陶渊明发展成为桃源乐土式的理想。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韵的笔触为人们绘出了一幅“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而“无君臣”的“怡然自乐”的生活画卷。然而，不管这种所谓的乐土被形容到多么美好的程度，也不管那里的人们被描画得多么悠然快乐，那实际上只不过是早已消逝了的原始社会的表面涂上一层理想主义的油彩而使之如海市蜃楼般地再现而已。所以，它很难转化成为激励人民为之奋斗的动力。尽管如此，世外桃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名士们寄托精神的所在，为他们带来了一点点人生的向往与欢快，也为久经战争创伤和政治动乱的人民的心灵带来了一点点慰藉。

况且，富有理想的人与无所追求的人的精神风貌是绝然不同的，有理想的人言谈讲究哲理，择友重视情操，作文注意文采，写诗崇尚意境，书法追求神韵，有理想的人善于转移自己的精神寄托，因而魏晋名士大多将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山水之间，将他们的抱负融化在文章、学问之中。他们勇于思索，敢于针对历史与魏晋的现实提出质疑，并在许多认识领域内提出崭新的见解。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构成了名士风度的美好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

魏晋时期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但却是思想获得相对解放的时期。由于摆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樊篱，文化多元、多途地发展起来了，人们不断地开辟着科学新领域，不断地创造着学术新观念。这不仅为佛教的输入，道教和玄学的兴盛开拓出一片自由的天地，而且使士人能够在科学与文化领域里任情适性地努力，较充分地施展才华。因而魏晋时期的学术与科技成果是空前的。难怪在魏晋及其稍后会产生出一大批

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及艺术家，会产生出一大批流芳千古的文章和科学发明及艺术珍品。

这样看来，酗酒和服药，只是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中的消极面；妍美流便、雄劲多姿的王羲之书法，传神写照、画尽意在的顾恺之绘画，等等，才是魏晋之际名士风度中的积极面的结晶，是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真正体现。

注：

①作此概称并对魏晋之际名士风度详加论述的还有不少文章。请参阅李泽厚《魏晋风度》，收于《中国哲学》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刊于《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本文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笔者认为，以名士风度来概称整个魏晋时代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是在以点盖面，因为这一时代的其他阶层的精神风貌也颇具典型意义，如豪侠风尚和开放的妇女风情等；同时，名士风度本身也并非魏晋时代所特有，在后来的南北朝时代仍然有其影响，虽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这些，笔者都将在《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详加叙述，本文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但因体例不同而行文有些差异。

作者工作单位：书目文献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